

山西地方志概述
刘伟毅主编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四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三十四

山西方志概述

刘伟毅 主编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K292.5/1

山西方志概述

刘伟毅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00204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200204

编 者 前 言

费了整整三年多的功夫，这套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地方志专家们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在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与具体合作下，其各分册的书稿多已数经编审与修改，即陆续可交付投入印刷了。

承蒙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朱士嘉同志为本丛书题签，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傅振伦同志为本丛书撰写了序言，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书法家们分别为丛书各分册写序或题签，或慨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特别是王季平同志和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江涛同志、吉林省文化厅顾问李石常同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同志和省图书馆顾问王化长同志、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许鼎同志等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这使我们丛书的编者和各分册的撰稿者倍受鼓舞，大家内心的喜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表达，在此，我们对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图书馆界多年以来在为读者提供地方志遗产的咨询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我们感到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项迫在瞬睫的工作。鉴于绝大部分的方志遗产是藏在图书馆里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年成立了地方史

志研究组，邀请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撰写文章，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论丛》。

此后不久，地方史志研究组又提出了将原《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加以扩展，使之向具体化，纵深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再进一步研究、介绍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首先，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一书基础上，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从我国1911—1983年近百种报刊中收录、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共六十余篇，分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本丛书的总论部分，书后附有1950—1983年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其次，在原《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一度曾题为《中国地方志考评》丛书）主体部分的编辑方案和组稿计划。我们的宗旨是：对全国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编辑出版专书予以深入、具体的评析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专评，使这整个文化信息构成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结构轮廓，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供有效地利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发出倡议，确定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及撰稿人。

这一编辑计划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都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协作。在将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全部方志研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价值，然后撰写成文。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现在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级现行行政区划辖下的地区、

行署、省辖市（州、盟）为单元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级下辖的地区级方志，是以旧府志、厅志、州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属下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卫所、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时，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本丛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即使这些微的作用，也未能如愿尽责。由于我们人少力单，学浅闻隘，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在每种书稿的编审过程中，力不从心和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比比出现的。加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遗产分布很不平衡，各分册的撰稿者所下功夫或深或浅，难能一致，故丛书的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此，尚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初审稿件时，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徐文绪同志、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同志、首都图书馆冯秉文同志、青海图书馆陈超同志、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倪波等同志的关怀和协助，我们愿借丛书的出版来表达感激之情。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在他古稀之年任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一直对编辑本套丛书予以关怀，并多次派他的秘书高甫同志向编委们传达他的具体指示意见。遗憾的是，在丛书编辑过程中，栗老溘然长逝，他身虽永息，遗志人间。我们今天仅以丛书的出版告慰前辈英

魂，倘冥老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了。

金 恩 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金恩晖	(1)
山西方志考略	刘伟毅	(1)
七种山西省志提要	刘伟毅	(15)
太原方志略考	齐书勤	(24)
晋中、阳泉地方志考存	齐书勤	(32)
吕梁地方志概述	齐书勤	(39)
临汾、运城两地区方志考略	赵冬生	(44)
长治市与晋东南地区方志概况	杨光亮 刘伟毅	(63)
大同市、雁北地区古方志概略	要子瑾	(67)
忻州地区方志简介	武海	(71)

山西方志考略

刘纬毅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是我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等自古以来就流传的历史传说,虽然未必可信,但“丁村”人和“匭河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我省南部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春秋时,这里是晋国。韩、赵、魏三分晋国后,有人称山西为三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这里为太原郡、河东郡、上党郡、雁门郡、代郡。汉朝设置十三州,下辖若干郡,这里为并州。唐置河东道,宋称河东路,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直属中书省。洪武元年置山西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山西布政司,清沿用未改。现今山西省辖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四市,晋中、吕梁、临汾、运城、晋东南、雁北、忻州七地区,及其所属 101 县(市)。

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就促使山西的地方志源远流长,相当发达。据考山西方志达 792 种,其中亡佚的 323 种,传世的 469 种。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总结,是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在大规模的编修地方志的今天,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候，山西就有了史书——《晋乘》，当时的晋国还出现了一批史家。著名的董狐，就是杰出的代表。然而出现地方史则是以后的事情。

山西最早的方志，要推魏晋之际的《上党记》。

《上党记》的作者不知为谁，也未曾著录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清儒章宗原在《隋书经籍志考证》里，谓：裴驷撰的《史记集解》、刘昭补注的《后汉书志》、酈道元注的《水经注》、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志》等书，都征引了《上党记》，可知编撰此书的下限时间，应在南北朝之前，又据《上党记》辑佚中述及“曹公（操）围壶关”和“建安十一年”，上限时间不能超过东汉末年。笔者近年写有《〈上党记〉辑佚》一文，发表在《山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可供参阅。从辑佚中看到，《上党记》记述了壶关、长子、铜鞮、襄垣、谷远、黎亭、潞国等地和浊漳水、沁水等水的地理形势，是我省最早的地志文献，极为宝贵。

东晋太兴二年（319），武乡羯人石勒称帝，建国号曰赵，“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①然其书未传。

北魏王遵业，太原人，官司徒佐常侍，他写了《三晋记》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曾征引，可知此书在北宋初年尚存，但以后就失传无考了。

隋大业中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在这次全国规模的编修方志活动中，当时称作并州的山西，产生了《并州总管内诸州图》一卷、《并

州入朝道里记》一卷。②前者未署撰人，郑樵《通志·艺文略》、王应麟《玉海》都曾著录，可见南宋时期尚在流传，后者为隋末唐初蔡允恭撰，早佚。

太原是唐高祖李渊发迹之地。唐朝为了纪念其起家，曾称太原为北京。因而，唐代的山西方志有了明显的发展。有《河东记》三卷、《太原事迹记》十四卷（又名《晋阳事迹杂记》）、《河东图》、《并州记》、《晋阳记》、《羊头山记》等六种。

《晋阳事迹杂记》，新、旧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北宋治平年间太原府刊刻行世。据知，此书为我国最早刊刻的一部地方志。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谓：“《晋阳事迹杂记》十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纂，序言四十卷，盖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从莆田李氏借录，自南渡以来，关河阻绝，图志泯亡，得见一二仅存者，犹足以发伤今思古之叹。”③元人编纂的《宋史》、《文献通考》和明人的《国史经籍志》都有著录，但以后就不知所闻了。我从宋人李昉修纂的《太平广记》中检到了四条，以《〈太原事迹记〉辑佚》为题，载于《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能使我们略知一二。

宋代的山西方志，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北宋时候山西出现了《河东路图经》、《河东路地图》、《河东地界图》、《并州图经》、《太原图经》、《岚州图经》、《晋城图经》、《辽州图经》、《解州图经》、《代州图经》等。其中，《河东路图经》多达一百一十四卷，为山西元代以前方志中的钜制者。据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太祖曾计划重修天下图经；景德四年（1007），真宗诏诸道修图经。④因此，《河东路图经》等，可能就是北宋早期的

著作。

宋室南渡后，山西沦为金元统治，这时产生了《晋阳志》、《泽州图记》、《五台县志》、《盐池记》。

《晋阳志》十二卷，金蔡珪纂。《永乐大典》、嘉靖《太原县志》均引用，后失传。

《五台县志》为金天会年间修纂。仅见康熙《五台县志》凡例。

《泽州图记》为金代学者李俊民撰写的一千五百言的一篇文章。它记述了泽州（今晋城）及所属县的地理沿革，间载历史大事。李俊民在这篇文章里，据事直书地说：“贞祐甲戌（1214）二月初一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揭露了元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破坏。此文载于成化版《山西通志》和《庄靖集》，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完整的地志文献。

《盐池记》一卷，金梁肃撰，光绪《山西通志·经籍记》著录。

元代山西方志据知有三种，即：河中志、代州志、朔州志。

从以上简述看，元代以前的山西方志，除了《泽州图记》外，其余均不传世。从几种辑佚本看来，文字都很简短，多系地理形势、建置沿革的记载，不及后世的方志那么完备、详尽，说明山西方志也象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二）

明代的山西方志，无论修志的广度，还是志书内容的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明代山西方志有

311 种之多，而目前存世的仅有65种。

明洪武三年（1370），太祖命儒臣魏俊等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为《大明志书》，其书不传。永乐十六年（1418），成祖“诏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并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山西由于地处边陲，为拱卫京畿之要地；在这次全国规模编修地理志书中，所有的府、州、县都积极行动起来，在短短的几年中仅《文渊阁书目》所载，就编修了112种地方志。这不仅在山西是空前的盛举，就在全国范围来说，志书数量之多，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位。⑤由于这些地方志都是进呈本，保存在皇宫内的文渊阁，未曾刊刻流传，所以在以后山西各地编写的方志里，始终没有关于这次修志的记载。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明代山西方志为：

洪武年间三种：《太原志》、《辽州志》、《平阳志》。

成化年间一种：《山西通志》。

弘治年间三种：《潞州志》、《浑源州志》、《应州志》。

正德年间四种：《平阳志》、《绛州志》、《长子县志》、《大同府志》。

嘉靖年间十五种：《山西通志》、《绛州志》、《蒲州志》、《解州志》、《太原县志》、《浮山县志》、《曲沃县志》、《翼城县志》、《荣河县志》、《孟县志》、《乐平县志》、《崞县志》、《河津县志》、《霍州志》、《大同府志》（补刻）。

隆庆年间二种：《襄陵县志》、《芮城县志》。

万历年间三十种：《山西通志》、《太原府志》、《汾州府志》、《泽州志》、《忻州志》、《代州志》、《应州志》、

《浑源州志》、《平定州志》、《絳州志》、《榆次县志》、
《太谷县志》、《徐沟县志》、《兴县志》、《临汾县志》、
《洪洞县志》、《太平县志》、《乡宁县志》、《猗氏县志》、
《潞城县志》、《怀仁县志》、《马邑县志》、《灵石县志》、
《安邑县志》、《稷山县志》、《沁源县志》、
《沃史》、《平阳府志》、《翼乘》、《定襄县志》。

天启年间二种：《太原县志》、《文水县志》。

崇祯年间三种：《河津县志》、《安邑县志》、《山阴县志》。

另有编撰年代不详的《龙门志》、《五台山志》两种。

其中，洪武年间的《太原志》、《辽州志》、《平阳志》均为《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所不载。前两种是1959年影印本《永乐大典》问世以后，才引起地方史志研究人员关注的。《平阳志》是近些年普查善本书中新发现的。

《太原志》的修纂者和卷数均不详。由于记事至明永乐年(1403)，又为永乐六年(1408)成书的《永乐大典》引用，无疑为永乐初年修纂。《永乐大典·太原府》引用《太原志》三百二十三处，约七万五千言。涉及太原府及所属县的沿革、至到、城池、坊乡、渠堰、风俗形胜、户口、田赋、土产、土贡、山川、祠庙、寺观、宫室、官制、公署、兵防、古迹、宦迹、人物等等。内容相当广泛，记载甚为详备。

《辽州志》的撰人和卷数亦不详。《永乐大典·辽州》引用此书四十三处，一万六千言。所列细目和《太原志》大体相同，另外又增加了“碑刻”的记载。

《山西通志》首创于成化，它以“体例完善、详略得体”而著称。此书十七卷、图一卷，胡谧编纂。胡谧，浙江会稽人，景泰进士，成化二年（1466）任山西金事提学，癸巳（1473）秋任山西按察司副使。他用了四年时间，于成化十一年（1475）编写成《山西通志》后，不久调往河南，于成化二十二年修了《河南总志》。可见胡谧是位十分关心地方志的文士。

胡谧在山西期间，为了实现创修《山西通志》的宏愿，他查访山西各地，“虽密林邃谷，豺虺之地，靡不周历。”所到之处，凡“残碣断碑，故基遗迹，名宦寓贤之类，靡不究其沿革盛衰之故，丰膏美恶之由。本之旧牒，参之前史，皆一一考之。”此书全面而详尽地记载了山西及所属府、州、县的设置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城池、关塞、津梁、烽墩、公署、学校、宫室、陵墓、寺观、物产、田赋、人物、诗文。是山西极为珍贵的文献。它在“户口”目下，记载了汉、晋、唐、宋、明历朝山西各郡、府、州、县的户数、口数，是我省最完整、最详细的历史人口统计资料。在“诗文”目下，收集了许多金元时期山西学者的文章和诗篇，十分可贵。

处于蒙古的瓦剌和鞑靼，是威胁朱明王朝安全的主要敌寇，因此，明政府对“京师屏障”的大同和“三关”（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俱在山西北部）的边防极为重视。在成化版《山西通志》、嘉靖版《山西通志》、正德版《大同府志》里，都对边关一带设卫、筑堡和堑窖、烽墩以及军旅、骑乘等，有着详密的记载，可补明史之所未备。

由于这个时期的山西方志实际上多为首创，缺乏前人的

经验借鉴，所以有些志书记事比较疏略，篇幅比较简短，特别是由于调查和考证的功夫欠缺，故内容也多有舛误。但总的说来，因为明代方志有刻本传世，编纂体例较为完善，对以后方志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是明代山西方志的理论，多为清代修志者所推重，这里不得不略加叙述。

根据笔者的涉猎，元代以前山西尚无关于方志的论述，而明代由于方志的发展，促使一些学者、修志者从理论上探讨方志的意义、功用，和总结其修志经验。许多修志者认为“志者，史之属也。”这就规定了方志属于史、而又非史的性质。尝仕陕西巡抚的猗氏人乔应甲指出：“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不谱之家无统，不史之国何征？”明确强调了修志的必要性。至于方志的功用，明儒认为可以使官宦士绅“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加强和巩固其封建统治。

一部好的方志的编纂标准是什么呢？《曲沃县志》的主修者刘鲁生指出：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也就是说，记载要尽其所有，无所不包；事实要仔细查对，翔实确凿；并且要是谓是，非谓非，敢于秉笔直书。四百五十年前能够提出这样比较全面、比较明确的方志标准，应该说是难得的。如何才能编好一部县志呢？刘氏指出：“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这样的修志经验，今天看来也不无参考价值。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者都强调修志要“实录直书”。嘉靖《太原县志·凡例》要求“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襄陵教谕吕调元亦说：“郡邑有志，犹国有史，所以

彰往昭来，贵实录也。”尽管受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实录”，但毕竟比“曲笔”、“隐恶溢美”的笔法所反映的事实要比较真实些。

(三)

现存清代山西方志 335 种，占现存方志总数的 76%，可谓山西方志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山西的行政区划为九府、十州、一百零八县。除平鲁一县未曾修志以外，所有府、州、县都有志书，并且不少县志在清代修了三、四次。

山西通志在清代修纂了三次。康熙版《山西通志》“采摭虽富，舛谬实多”。雍正版《山西通志》“发凡起例，颇得体要。”然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考究者，要算光绪版《山西通志》。它出自著名学者王轩、杨笃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的手笔。他们都兼备史德、史才、史学，因而该书在光绪十八年（1892）问世后，立即引起省内外学者的推崇和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它为全国杰出的方志之一。

杨笃编纂的《代州志》，用戴震《汾州府志》为例，诗文散注于各条之下，不别汇为篇；用康海《武功县志》为例，援引书籍皆一一注明所出，以示征信。其艺文篇不录诗文，惟载书目，书目下或录其序跋，或提事勾玄。如无目录学的造诣和广博的学识，是作不到这样的。

在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的影响下，清代山西方志都比较注重了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如乾隆《长治县志》关于著名潞绸的记载较详，它说：“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

张”，“顺治每岁造绸三千匹”，并说蚕丝来自川、浙等地。这是研究山西丝织工业史的重要史料。乾隆《曲沃县志》记载的明末由福建传入曲沃种植烟草的资料，是我省烟草起源的最早记录。再如光绪《平定州志》反映的阳泉一带村民采煤的经验说，看一看山上的石脉，就知道有没有炭；敲一敲炭，就知道火力是否耐久，说明了煤矿工人采煤的丰富经验。再如雍正《山西通志》记载的明万历元年(1573)，静乐雁门村之陨石重千斤，是我国最早、最大的陨石重量的载录，光绪《凤台县续志》对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的灾情作了具体记录，称：“野无青草，人食树皮草根，牛马鸡犬皆尽，继食人肉……有全室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这些例子证明了清代山西方志，确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

清儒崇尚考据之学，这种学风也影响到了山西方志的修纂。如乾隆《曲沃县志》，勇于探索，不囿成说，考证出晋国的曲沃古城，不在汉魏以来史学家一直认为的今闻喜县北，而在今曲沃县城南二里的古城；晋都新田不在传统认为的今曲沃城，而在今侯马。这一创见为解放后“新田遗址”的发掘所证实。再如光绪版《山西通志》中的《金石记》十卷，收罗宏富，考订精确，向为海内金石家、考古家推崇，因而另印单行本，取名《山右金石记》行世。

清代山西方志之所以如此盛行和发达，当然和清政府多次通令修志有很大关系；但同一些山西籍的重要官员和学者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也有直接关系。

曲沃人卫周祚，康熙初年任清政府的首辅——保和殿大学士。康熙皇帝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十一年(1672)通令全国修纂地方志的。在这前后卫氏为《曲沃县志》、《长